

殷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何毓灵

核心阅读

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工业方面有高度的发展,以青铜铸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很高,玉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生产达到相当的规模。不同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布的模式也影响了西周及之后的手工业生产。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现存最重大的青铜礼器,是殷商时期青铜文明的典范之作,标志着当时青铜铸造的水平。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技术,铸造后母戊大方鼎的技术难度并不亚于当今任何一项高科技,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合作,而一些核心技术更是只有极少数人严格掌控。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基本了解当时不同手工业生产的布局,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大的手工业作坊区。每个手工业作坊区内部又有多种手工业生产并存。这种分工明确又相对集聚的模式承自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并在之后的西周发扬光大。

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布

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百工虽是虚指,但也能说明殷商时期的手工业门类相当齐全。殷墟自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就有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漆木器、纺织品、车马器等器物数量巨大。仅妇好墓就出土青铜器460余件、玉器近千件。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截至目前,已发现铸铜作坊7处、制骨作坊4处、制玉作坊1处、制陶作坊1处。另外还发现一些制石作坊、制蚌作坊的线索。因地下埋藏3000多年,我们已很难发现漆木器、纺织、酿酒、皮革等手工业遗存。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手工业作坊最多的单个遗址。

根据已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我们大概可以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手工业区。

中部手工业区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已知的作坊遗址主要有铸铜、制玉,另有制骨、制石、制陶的线索。南部手工业区位于宫殿宗庙区以南约1公里的区域,由苗圃北地铸铜、铁三路制骨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三处作坊遗址组成。西部手工业区距宫殿宗庙区2—3公里,分别发现有孝民屯铸铜和北辛庄制骨两处规模较大的作坊遗址。东部手工业区与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发现有铸铜、制骨与制陶等作坊遗址。另外,在任家庄南地、北徐家桥、戚家庄东等地也发现有铸铜、制石、制玉等作坊遗址,但因周边区域相关考古工作较少,是否也是手工业集聚区,尚待以后的发掘。

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大面积的宗庙宫城区、规模宏大的王陵区共同构成了30万平方公里的殷墟大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在龙山时代就已雏形,到了二里头时期已较为明确。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内就发现有铸铜、绿松石加工等专门的手工业作

坊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商代的青铜铸造业更加成熟,种类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复杂,所发现的铸铜遗址也越来越多。

手工业区内分工明确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东北部发现一座属于商代中期的都城,命名为“洹北商城”。这座早于殷墟的都城由郭城、宫城、宫殿、手工业区、贵族与平民居住区等构成。在手工业区内发现大量铸铜、制骨与制陶遗存,集中分布于宫城北城墙以北约570米,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

从时间与规模来说,殷墟的中部手工业区生产规模偏小,持续时间短,特别是铸铜生产。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大量火烧废弃堆积表明,洹北商城毁于火灾。迁都不久,仍在营建的都城成为废墟,仓促间于河南南岸恢复生产、重建宫室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大量宫殿建成,铸铜、制陶等生产用火行为同样对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异地生产成为必然。南部手工业区在此背景之下产生。

南部手工业区开始于殷墟一期,与中部手工业区相衔接,持续生产至殷墟四期。其中苗圃北地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铁三路制骨生产规模较大,仅在有限的区域内就出土了废弃骨料、边角料36吨,推测当时生产了几十万根以骨笄为代表的骨器。刘家庄北地是殷墟目前唯一的制陶作坊,以生产泥质的陶豆、陶簋、陶盆等为主。

青铜礼器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原有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增建手工业区势在必行,西部与东部手工业区应运而生。西部手工业区以孝民屯铸铜作坊规模最大,主要生产青铜礼器和兵器,时间则从殷墟二期延续至西周初年。这里发现的陶范、模、芯等铸铜遗物10余万件,数量惊人,由陶鼎足模、范芯座等推测,当时应该还铸造了比后母戊大方鼎还要庞大的青铜器。

东部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大司空南地,铸铜作坊于1936年被发现,但相对而言规模不大。制骨、制陶作坊生产规模也较小,制骨材料以牛骨最多。

研究表明,手工业区内部分工已较为明确,生产工序清晰,产品也有所区别。比如在孝民屯铸铜作坊,西部主要生产兵器与工具,而中部、东部主要生产礼器;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主要生产泥质的豆、簋等,没有发现夹砂的陶器。

殷墟时期采用族邑模式,都城之内由相对独立的众多族邑聚落组成,既是生产、生活的区域,也是死后家族集中埋葬的墓地,“居葬合一”。目前仍在发掘的洹北商城手工业区内已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由东向西相邻分布。在铸铜作坊区发现百余座墓葬,其中50余座排列有序,随葬有陶范、鼓风机、铜刀、磨石等生产工具,无疑是工匠之墓。由此可知,很多手工业区内也是居葬合一。

严格控制关键技术的流失

有考古学家分析指出,青铜容器和大型玉器生产是政治性产品,不是可以流通



①



②



③



④



⑤

版式设计:赵德汝
本版图片均由文章作者提供。

的商品。夏商周时期,“器以藏礼”“器以载道”,所以对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制产品的生产、流通加强管理、有效控制是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

如何控制与管理?办法主要有3种:其一,设立集中的手工业区;其二,采用家族模式,这样既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承,更有利于严格控制关键技术;其三,国家设立专门的职官从事管理。

考古已知,在二里头遗址内,铸铜、绿松石等重要的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宫城核心区以南,四周建有围墙加以保护。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也是如此,铸铜作坊外挖有围沟用于防护。以青铜铸造为例,复合泥范技术要经过制模、制范、熔铜、浇铸、打磨等工序,熔铜后还要按比例掺杂铅、锡制作合金。无论是王室管理还是家族式管理,关键技术的传承都有严格的规定。

当时不同手工业区内技术如何交流、骨器等非政治性产品如何进行贸易等问题,我们还不得而知,期待通过考古的推进找到答案。

我们也关心殷商之后的周朝如何布局手工业生产。在陕西的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凤雏、云塘、齐镇、召陈等地发现有规模可观的铸铜、制骨、制石、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不同的手工业作坊分工明确,相对集中。在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且以礼器陶范居多。发掘者认为武王灭商后,大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殷商手工业家族被封、迁徙,继续为周王室服务,手工业的管理模式也被继承。西周时期封国众多,在晋国新田故城遗址、燕国琉璃河遗址、齐临淄城內都发现有手工业区存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①为如好墓出土的骨笄。

图②为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的无字甲骨。

图③为孝民屯出土的铜分档鼎陶范。

图④为殷墟郭家庄出土的铜分档鼎。

图⑤为后母戊大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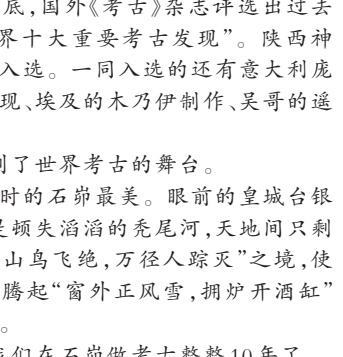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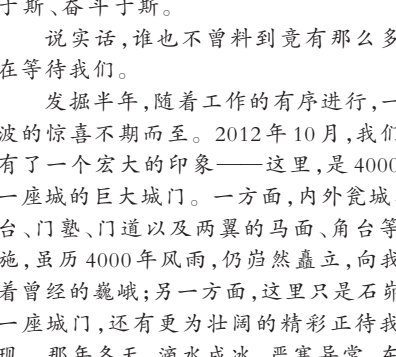
②



③



④



⑤

石峁十年

邵晶

于斯、奋斗于斯。

说实话,谁也不曾料到竟有那么多的惊喜在等待我们。

发掘半年,随着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波又一波惊喜不期而至。2012年10月,我们对这里有了一个宏大的印象——这里,是4000年前的一座城的巨大城门。一方面,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门道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向我们诉说着曾经的巍峨;另一方面,这里只是石峁城址的一座城门,还有更为壮阔的精彩正待我们去发现。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严寒异常,东门那面飘扬的鲜红队旗,映着大雪在凛冽的寒风中舒展张扬。

日复一日,无数次的日出日落,无数次的满天星斗,还有冬季一场又一场从不缺席的雪,和从来不会迟到的春暖花开。

2016年,在完成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等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后,石峁考古的重点转向皇城台。经过几年的探寻,如今皇城台的考古发现带领我们已然迈出探索

“石峁王国”的重要一步。大台城、大台基、大房子、玉器、石雕、铜器、象牙等高等级遗存无不坚定着我们对皇城台的认识和判断: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或许应该定其性质为“石峁宫城”。

作为“考古中国”的重要项目,围绕石峁的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停过。最新的调查不断提示我们,石峁不孤、石城不孤。府谷寨山等周边20余座次级聚落分布在石马川、窟野河等黄河一级支流,以众星拱月之势维系着石峁城的中心地位。种种判断逐渐浮出我们认知石峁的水面,石峁都邑身后的石峁王国影影绰绰、相伴而来。

从外城东门到皇城台,雪的洁美飘逸从不会变过,我们对于石峁的情感也不会变过。所以,才会愿意在石峁生活10年,辛劳10年。10年,也曾面对缺水少电、暴雨寒潮、虫蝎横行,朋友们说是坚守,但我更愿意说是享受。10年,石峁从未辜负过我们的每一次探索,一次次带来的只有更大的惊喜。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学文人文脉的生动展示

石钊钊

新年伊始,辽宁省博物馆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向大家献上了一份年节文化大餐。展览虽以唐宋八大家为题,却是一场立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艺盛宴。唐宋时期的文学名著与文人交往留下不少文坛佳话,百余件(套)绘画、书法、碑帖、典籍、器物等从不同方面呈现了那个时代馈赠我们的文化遗产。诗中自有情话意,画中无咏却成诗。古人常以“无声诗”形容画品诗意,也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展览。

文垂千载

展览从“文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方面充分展示那些影响了我们文学记忆的经典。

《诗经》是南宋时期书画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宋高宗赵构常以楷书题毛诗,再由工部侍郎马和之补绘图本,遂成南宋画院范本。本次展览的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唐风图卷》即是以诗画结合方式表现诗经“国风”题材的传世佳作。诗经十五“国风”中,“唐风”收录12首。本卷图文相合,原本晦涩的经典加入图绘,更便于理解。现存《唐风图卷》有三,除辽博本外,另有故宫博物院、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两本,尤以辽博本品质最佳。

陶潜的名篇《归去来兮辞》与《桃花源记》也是历代名家书画的重要题材。赵孟頫行书《归去来兮辞卷》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此次展览最为引人注目的即是明朝马轼、李在,为夏芷合绘的《归去来兮辞图卷》。此作三人皆为明代早期内廷画风代表人物,马轼为宣德年间文学家兼画家,擅长山水画,也与宫廷画师合作,与戴进等人名震京城,其所传画作多与陶渊明诗作相关,对田园隐逸题材情有独钟;李在为宣德年间画院待诏,《画史会要》称其“自戴文进以下,一人而已”;夏芷师从戴进,所传画迹极为稀有。此卷颇具南宋画院遗风,水墨清流向各具风神,将“归园田居”“归庄”的文人淡泊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人佳话

作为展览的第二单元,文人交往与文人画成为了了解唐宋八大家的范本。这里不仅介绍了唐宋八大家的活动轨迹,也力求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向观者展现那个纷繁的文艺时代。苏轼作为北宋晚期著名文人,其文学创作与生平轶闻、交友雅集成为历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西园雅集”“夜游赤壁”“东坡游”“烟江叠嶂”等题材的画作多有涉及。此次展览以“赤壁”为题的书画中,尤以明仇英《赤壁图卷》最为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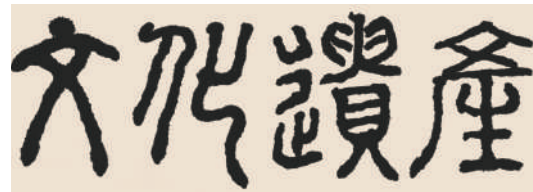
以《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为题的画作自苏轼时代已有传世,至元明之际因文人画派与吴门的发展而愈发兴盛。作者仇英位列吴门四家,因与江南收藏家周凤来、陈官、项元汴等交往密切,得以研习宋元遗珍,画入宋格。此画笔墨熟,用笔绵密而稳健,设色清丽,确为佳品。

传承有序

展览尾声以礼嘉风范为引,强调文人风致下的格言家传。所选格言、家训、语录,都是文人礼义修身典范。《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为《谱图序稿》与《夜宿中书东阁七律诗》两作合卷。《谱图序稿》作于至和二年(1055),作者时年49岁。唐末五代时局动荡,历代传承的世家族谱、家谱也随之散逸。作为传统文人的代表,欧阳修竭力呼吁重振谱学。《夜宿中书东阁七律诗》则用笔优美,律律清新流畅,此诗作于嘉祐八年(1063),作者时年57岁。因序稿与诗皆为稿本,故行文间笔墨涂改皆保留行间,足见作者当时情态。卷中剪裱可见南宋名臣周必大所作三跋,知此卷南宋时由周必大所藏,元时由欧阳修六世孙欧阳耐轩得于钱塘,又传八世孙欧阳彦珍,可谓传承有序。

文学、文人与文脉,是华夏文明中的璀璨之光。此次展览精选书法、绘画、典籍、墨拓与器物之珍,力求全方位展现文学与美术中的精神价值,让观者透过文物的点滴,饱览历代文人多姿多彩的趣味。

上图为明仇英《赤壁图卷》局部。



考古札记



图为雪中石峁。